

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农书——《四时纂要》

□ 李国江

历史文化典籍

《四时纂要》以“四时”为名，是一本月令体农家杂录。此书以时令为纲，按月分条叙事，辑录了农业生产及农副产品加工和农家日常生活所需的各方面知识，是一部内容广泛、叙述详细的“农家实用大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四时纂要》作者韩鄂，史料对其记载很少。农史学家缪启愉指出：“只有在《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上列有这个名字，没有任何事迹记载，是唐玄宗时宰相韩休之兄偲的玄孙。”记载中对其的生卒年也没有提及，这相应地造成了该书成书年代的问题。对于韩鄂和《四时纂要》的成书年代，现在学术界一般都采用“唐末五代说”。

《四时纂要》的原书在我国早已散佚，但是先后在日本、韩国发现了此书两个版本，其一为1960年在日本发现朝鲜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重刻本，1961年由日本山本书店影印出版。其二为近年在韩国醴泉郡发现的用朝鲜“癸未字”刊印的《四时纂要》，此版本比在日本发现的重刻本《四时纂要》早了180余年，是目前世界上《四时纂要》最早的版本。根据前者版本的影印版，缪启愉整理修订为《四时纂要校释》，由农业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这是目前国内通行的原书内容最完整的版本。

《四时纂要》是承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史的纽带。成书于唐末五代的《四时纂要》，是韩鄂在采集前代农书等资料的基础上辑录而成，当然也不乏始见记载的资料。作者在《四时纂要·序》中指出：“遍阅农书，搜罗杂诀，手试必成之醯醢，家传立效之方书。”并自述“事出千门”，如《月令》《家政令》《汜胜之书》《保生月录》《齐民要术》《山居要术》，也有张仲景、孙思邈、王焘等人的医书、方书等。另外，也不乏作者自己的经验实录。对此，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守屋美都雄指出，《四时纂要》“采诸家农书，纪风云之候，录种植之法，下及方书畜产之事皆载”。可见其资料征引十分宽泛，其中保存了不少散佚的资料，对后世的农书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元代的官撰农书《农桑辑要》几乎全部选录了《四时纂要》中首次记述的内容，《种艺必用》更是抄录了《四时纂要》的大量资料。



《四时纂要》农事资料的保存和传承，填补了自6世纪初（北魏）《齐民要术》至12世纪初（南宋）《陈旉农书》之间相隔6个世纪的空白，对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发挥了纽带作用。另外，对于研究唐、五代的历史和经济，《四时纂要》也具有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

《四时纂要》呈现了中古时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样貌。全书按四季分列内容，其中春令两卷，夏令、秋令、冬令各一卷，共五卷，计4.2万余字，698条，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直接记述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知识，共350条。这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包括粮食、油料、纤维作物、蔬菜、染料作物和采制染料、蚕桑、果树、竹木、茶、牧养、兽医方剂、养鱼、养蜂等；农副产品加工和制造，包括沤麻、动植物纤维织造和染色、酿造、制饴、乳制品、油脂加工、淀粉加工、动物胶、食物腌藏和贮藏；医药卫生，包括药用植物栽培和收集、药剂、药物保藏、润肤和装饰等；器物修造和保管，包括生产工具、武器、油衣及漆器、皮毛衣物、书画、笔墨及日用杂器、修葺墙屋；商业经营和高利贷，包括农副产品买卖和高利贷；教育文化，包括学文化、学方术、学武术，以及赈济。其中重点又在前三项。在该类记述中，果树嫁接，合接大葫芦，苜蓿和麦的混种，茶苗和桑麻、黍稷的套种，种生姜，种葱以及兽医方剂等较前代均有发展进步。最早记载了木棉种植法、种薯蓣、种菌

子和养蜂法。副产品的加工制造方面也记述了不少创新方法，如酿造方面，介绍了豆豉、麸豉、药酒、果子酒、酱油和醋的制作方法。其中，最早介绍利用麦麸制“麸豉”，制酱成为现代酱油的发端。在医疗方剂方面，介绍了药剂验方、药物保藏、润肤和化妆品的知识。其中采录的多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成为现存农书的最早记载。在服饰方面，有皮毛丝绸衣物。另外还有大小农具和日用杂器的修造、墙屋的修葺、以农副产品为对象的经营买卖的知识。另一类则是围绕农业生产，记述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项民俗及心理信仰，包括占候、择吉、禳镇等习俗现象，占348条。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内容在现代看来往往被视之为“迷信”，但是在作者观念中生产技术和生产习俗则是一个统一整体，这些习俗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直接关乎农业生产的丰歉。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中古时期，农业种植、农俗及岁时是作为统一体存在于当时民众意识之中。因此，从农学角度看，《四时纂要》无疑是关于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管理措施的农书，但从民俗学角度看，它的丰富内容又反映了处于唐、五代间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习俗及观念，这对于考察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史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

《四时纂要》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助国劝农的社会思想。就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而言，农业是安民富国的根本所在。“舜禹胥臈，神农憔悴，后稷播植百谷，



帝尧恭受四时。是以德迈百王，泽流万世者也。复有商鞅务耕织，遂成秦帝之基；范蠡开土田，卒报越王之耻。”圣贤例绩无不昭示出农业为本的极端重要性。先秦以来儒家教民稼穡为政的理论更为历代治国者所遵奉，将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要务，从治国安邦出发，形成了助国劝农的社会思想。以此思想为指导，历代农书的编纂者以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为宗旨，通过著书立说为助国劝农鼓与呼。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叙述编书目的时开宗明义曰：“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为本”，并认为这是“贤愚共守之道也”。韩鄂告诫道：“且商辛之有八荒而国用不足，姬昌之王百里而兵食有余。非夫天雨粟于周而降水旱于纣，盖不务劝农之术而无节财之方。”从编书缘起可见其以农为本、劝农为志的思想取向。为达到助国劝农目的，《四时纂要》承袭月令体体裁加以记述，使得一年农事及生活的安排清晰明了，农人可以更方便地掌握，以利于指导农事。同时为保证劝农效果，《四时纂要》还将关于气象时令、作物品种、畜禽饲养、耕种灌溉、农具使用等方面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管理措施详尽列出。此外，《四时纂要》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一种与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社会行为加以记述，认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农业的丰歉有关，以此凸显农业生产在民众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用习俗规范引

导民众树立以农为本的意识，从而达到劝农的目的。农业乃立国之本，盛世之基，《四时纂要》的助国劝农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四时纂要》彰显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据朝鲜《世宗实录》载，“传旨户曹，各道移养麦耕种，考《四时纂要》及本国经验之方，趁时勤耕”。可见《四时纂要》曾是古代朝鲜劝课农桑的重要教材。不仅如此，《四时纂要》还是朝鲜农书的重要蓝本。学者研究发现，在李氏朝鲜后期的农书编纂中，《四时纂要》一直作为被摘录、引用的文献，在农耕技术、畜牧蚕桑、灾害防治等方面为其农业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时纂要》流布并保存于国外的情况足以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见证，这对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四时纂要》多方面的记述，较全面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既有实际经验技术，也有信仰虚妄成分，这是近代科学建立之前不可避免的。《四时纂要·跋》记有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刻本的题记：“余今雕印此书，盖欲盛传于世，广利于人，助国劝农，冀万姓同路富寿者也。凡百君子，依而行之，则乃子乃孙，定无饥冻横天之患。”《四时纂要》的积极价值，此赞誉可谓中肯，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人才哲理

□ 李志刚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贤重才的优良传统，几千年的国家民族兴亡史也是一部人才兴衰成敗史。中国也是一个诗词文化大国，中国的诗词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浩如烟海。在这个巨大的诗词宝库中，蕴藏着许多反映人才成长规律的名篇杰作。从刘邦“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吟唱到晚清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无不体现中华民族对人才的重视和渴求；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到赵翼“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赞叹，无不反映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优秀人才辈出的生动场景。

自古以来，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建功立业，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重视人才、爱惜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唐代大诗人杜甫“安得须臾出群材”的名句深刻揭示了天下之安危关键在人才的道理。历朝历代，无论是平定天下，还是治理天下，都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北宋诗人张耒的诗句“人才之难万冀一，一士其重九鼎轻”，充分彰显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蕴含着“人才难得”的道理。一方面从稀缺性上表明人才的难得、珍贵，如古人所说：“人才何其鲜，求一于百千。”另一方面从对比的角度反映出人才对治国理政的举足轻重。“九鼎”是国之重器，人重而鼎轻，更凸显了人才的重要性。南宋诗人陆游的名句“人材衰靡方当虑”，则揭示了人才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晚唐诗人罗隐的“裨补明时望重才”诗句，昭示了匡正时弊、补救政误需要重用人才的深刻道理，也蕴含着重视人才要有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方的哲理。

重视人才培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人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古代圣

贤孟子就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历代诗人也在诗词歌赋中对人才培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名句“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就昭示了封建朝廷不能爱养人才、导致国家衰败的深刻教训。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名句“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则深刻揭示了人才实践成才规律：对人才既要精心培育，又要放手使用，形成人才成长的叠加效应。南宋诗人厉寺正也写出了“人才谁不出陶镕”的名句，揭示了人才成长离不开陶冶熔炼的深刻道理和“补偿成才”的原理。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修炼多从苦处来”诗句则反映了人才发展史上逆境成才的普遍规律：对出身低微而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参与军政大事，在实践中砥砺磨练成才。

贤能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发现人才、举贤荐能成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的典型特征。历代诗人也对如何发现人才的社会现象及内在规律作了深刻总结。唐代知名诗人寒山的诗句：“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则深刻反映了人才生长的一个特殊现象：历史上的许多优秀人才，在没有出名之前，大多身世

卑微，家境贫寒；同时也体现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识才用人观。唐代诗人杜牧“潜龙须待一声雷”的名句，则是对潜人才现象的深刻揭示：潜人才要转化为显人才必须有足够的定力和韧劲，正确面对挫折失败，在坚韧不拔的努力中等待时机、把握机遇，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同时，时代变迁、慧眼识才、机缘巧合等“一声雷”也是潜人才成为显人才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世无伯乐良可嗤”的名句，反映了历史上发现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优秀人才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和培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发现和培养人才的“伯乐”，社会就容易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准确识别人才、正确评价人才是选准用好人才的重要保证。历代诗人对人才评价识别的科学方法、有效手段及规律特点作了深入探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深刻揭示了人才学中的一个重要规律：辨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人才，需要靠时间来检验。这反映了评价识别人才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自古以来，我国历代杰出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都注重德才兼备，强调以德为先、以德为本。南宋

诗人陈普的名句“古人才德难求德”，则阐明了“德”在人才评价识别中的极端重要性，揭示了在人才的培养选拔上德才标准的本质特征：一是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德更重要，以德为先，因而求德难；二是在衡量德的标准时，高尚品德难求，但始终如一坚守品德更难。康有为的名句“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表明，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时代所渴求、所呼唤的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如诸葛亮一样的盖世奇才，从而昭示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深刻道理。

选拔人才是用好人才的前提和基础，如何选拔出优秀人才是历代诗人吟诵的重要主题。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对古往今来选拔人才规律的深刻总结，反映了人才选拔使用的一种特殊性：大格不破，大才难出。人才的成长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充满个性、各有不同的。对不同特点、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用不同的选拔方法，才能使他们脱颖而出。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的诗句，则深刻揭示了人才选拔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品行优秀的人才只有靠公正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才能选拔上

来。南宋诗人项安世的“四海人才容接里”诗句，深刻阐释了选人用人的关键在一个“容”字的哲理。只有对人才包容、优容、宽容，才能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育才才识才选才，最终是用才，用好人才才是治国兴邦的根本。古代诗人对历史上不同时代使用人才的规律特点作了深刻揭示。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用贤无敌是长城”，揭示了古往今来国家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规律，人才聚则天下兴，人才散则天下亡。只有广纳天下英才，在选贤任能上具有无敌于天下的优势，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古今人才自警自励的名言，深刻揭示了人才成长过程中自信、自知、自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清代大诗人袁枚的诗句“人才那得如金铜，长在泥沙不速朽”，则深刻地揭示了人才的使用规律：金和铜埋在地下上千年，挖掘出来经过磨洗后依然能够闪闪发光；而人才一旦被埋没后，就会错过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很难再重整旗鼓了。因此，使用人才必须善于把握“火候”，在人才的创造力处于最活跃的高峰期及时启用，为其提供搏击长空的机会和舞台。纵观古今中外，人才顺利成长、

充分发挥才干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尊才爱才、重才惜才、容才用才的社会环境是群贤毕至、人才辈出的必要条件。宋代诗人施宜生的诗句“算来栖凤莫非桐”，形象地揭示了环境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人才如同珍贵的凤凰一样，对生长环境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古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察人用人，关键是要“宽些尺度”，扬长避短，“不以一眚掩大德”，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欧阳修的名句“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深刻揭示了人才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人才的个性才得以张扬，聪明才智才得以尽情发挥，才能形成人人竞相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活泼局面。一个社会重视爱才风尚的形成，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教化，根子在用人。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千古名句，体现了古往今来育才护才的最高境界和无私情怀。

在中国历史上，人才的兴衰成败与历史机遇、时代变迁密切相关。历代诗人对人才与时运的关系也作了深入解读。清代诗人查慎行“英雄时至适成名”和“时平谁敢说雄才”等名句，反映了历史上江山更迭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了时势造就人才、人才引领时代的历史规律，昭示了人才成功机遇的时效性和周期性。社会大批人才和一个时代人才成长，除了内动力，还必须具有社会动力，时代的需要就是全社会人才辈出的驱动力。北宋王安石的名句“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英谈中”，揭示了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规律：时代的风云变幻，是人才施展抱负才华、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人才只要把握好机遇，就能大显身手、大展宏图。